

上海城市特质及其魅力

熊月之

是什么使得上海成为今日之上海? 上海这座城市有有什么样的特质? 这些特质又如何影响着上海的演进? 国内外历史学界曾经有不少人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近年来上海的飞速进步与发展, 更使上海史研究有可能成为一门“显学”。

近二十年 然兴起的上海史研究热潮告诉我们, 上海必有值得研究的特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 就是形成了一股久盛不衰的上海史研究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上海史研究成果成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 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 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300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方面, 从吴贵芳著的《古代上海述略》(1980), 刘惠吾主编的《上海近代史》(1985、1987), 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1989),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 到前两年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1999), 还有形形色色的回忆录、大事记、图片集, 满坑满谷, 令人目不暇接。至于文学、美术、电影、电视等领域, 上海史更是热门题材, 常谈常新。

其次, 上海史研究越出了上海的范围, 成为全国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对象。在北京、天津、武汉、南京、广州、济南, 以上海史为博士、硕士论文题目的, 以上海史为出版社出书重点的, 不胜枚举。80年代后期, 华中师大乐正以《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为博士论文题目(此书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标志着上海以外学者对上海史的重视。21世纪之初, 北京学者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2002,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则标志着上海以外学者对上海史

研究新的取向。

再次, 上海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空前繁盛。在美国, 西部伯克利、戴维斯、洛杉矶、俄勒冈, 东部康奈尔、哈佛, 北部密西根等大学, 都各有一群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澳大利亚, 我国的香港、台湾, 也都有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 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戏称。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远东历史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等, 也都经常发表关于上海史的论文。英语世界最权威的亚洲研究刊物《亚洲研究季刊》, 1995年特辟上海史研究专号, 这在城市史研究中极为罕见。前几年, 美国学者召开过一次关于中国城市史的讨论会, 题目是“上海以外的中国城市”。以往在美国举行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讨论, 上海史常居中心位置, 以致于他们要想出这样一个会议题目。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1年, 英语世界以上海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就有328篇, 远远超出对中国其他城市研究的兴趣。

国际性的上海史研究热, 还表现在西方一些先前不研究上海史的汉学家、汉学机构, 这些年转而从事上海史研究。曾经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教授, 先前研究兴趣主要是清初历史, 写过著名的《洪业——清朝开国史》, 而这二十多年来一头扎进上海史, 主持一系列上海史研究项目, 培养一批上海史研究生, 接连出版了三部著作。德国科学院院士、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瓦格纳, 先前以研究《老子》王弼注和道教著名, 现在带着一批研究生, 进军上海史领域。前两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上海史讨论会,

海德堡大学一下子派出由五名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前来参加,令人刮目相看。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近代上海小报之多之全,在全世界汉学界负有盛名。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向以研究传统汉学出名,现在也有学者研究上海史。

至于西文世界出版的上海史著作,门类繁多,内容广泛。比较著名的有魏斐德的《上海警察》、《上海歹土:孤岛时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危机,1937-1941》,马丁的《上海的青帮:政治和有组织的作科犯案,1919-1937》,克利福特的《帝国被宠坏的孩子:在上海的西方人士和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梁元生的《上海道台:一个变动社会的连接性人物》,斯蒂芬斯的《中国的秩序与纪律:上海的会审公廨,1911-1927》,福尤斯密斯的《民国时期中国的党派、国家与地方士绅:上海的商人组织和政治,1890-1930》,白吉尔的《上海史》,安克强的《上海,1927-1937:市政权力、地方性和近代化》,顾德曼的《同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方性网络和认同感,1853-1937》,韩起澜的《在中国人中制造种族:上海苏北人,1850-1980》,贺潇的《危险的欢娱:二十世纪上海娼妓与近代化》,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文化变革》,卢汉超的《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每个城市都有重视自己历史研究的理由,上海本地学者重视对上海历史的研究,并不奇怪。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学者对上海历史研究得多一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学者都把目光对准上海史研究,

然有成为“上海学”之势,这就告诉我们,上海必有值得研究的特质。

上海史研究热的兴起,一些显而易见的的原因是:首先,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是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最密切的中国城市。1949年以后,前30年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

商业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要研究近代、当代中国,就一定要研究上海历史。

其次,与史学发展走向有关。最近二三十年,世界史学出现了一个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普遍变化,即重视对社会大众、社会底层的研究,西方学术界更注意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来解释历史,更强调研究普通民众的历史,强调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因此,关于女工、帮会、警察、苏北人、同乡会、职员、妓女、小市民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此外,近代上海是中国出版中心,是报刊最密集的城市,也是档案收藏最完整的城市,在史料方面比较容易满足中西学者的研究要求。

经济色彩强而政治文化色彩弱,上海在以往时代所具有的这一边缘性特质,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蕴含着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品质

上海史研究热的兴起,更与上海城市特殊的内涵有关。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国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并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个别西方人所说的荒凉渔村,也不是特别显赫的名城大市。

但是,与北京、苏州、广州、福州等城市相比,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但不是全国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苏省,普遍被认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响很大。

在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上海。他们最早钟情于有通商传统的广州,也曾经寄希望于福

州、宁波,但是,最后因缘际会,上海成了对外通商中心。此中原因极其复杂,一言难尽,很重要的一条是区域人文特点。广州虽有重商传统,但作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也有中华至上、鄙夷西人的传统。所以,广州开埠以后,西人在那里遇到强烈排拒,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后,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视商业利益。在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里,欧美洋商与闽鲁土商差别不大,所以,他们可以与欧美商人和平相处。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则愿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经济色彩强而政治文化色彩弱,上海在以往时代所具有的这一边缘性特质,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蕴含着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品质。上海租界的独特性,使得上海的这种品质由潜在变成事实。

上海最初设立的租界,并不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那种形态。其一,华洋分离,人口不多。按照规定,租地范围内华人不能自相议租,华人可以到英人租地公建市房中进行买卖交易,但不能租房。其二,租地有一定限制。英商租地每家不得超过十亩,如租定后,并不建造可以居住贮货房屋者,即系违背条约,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查明,将其地基拨给别家租赁。其三,治安管理权仍归上海地方政府。这些规定,在租界设立以后的八、九年中,执行得比较严格。如果这些规定日后一直严格执行,那么,上海租界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国中之国”,充其量只能是广州租界沙面第二。广州沙面租界设立以后,租界与华界之间开挖了人工河,一直严格实行华洋分居原则,地狭人少,发展极其缓慢。

上海租界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是在1854年以后。1853年至1855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大量华人涌入租界,华

洋分处变为华洋杂居。1854年租界修改土地章程,随后才出现工部局、会审公廨、万国商团等机构。其时清朝中央政府忙着镇压太平军,上海地方政府瘫痪,无暇顾及此事。从此,租界性质才发生重大变化。这既不是租界当局预设的目标,也不是哪一个地方官员无能,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

对于上海租界,有一种偏颇看法,以为与殖民地是同一性质。其实,上海租界(特别是公共租界)与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在性质上有重要区别。在主权上,一是割让,一是租借,截然不同。在治权上,香港总督代表英国政府行使权力,而上海公共租界则是居民自治,掌握实权的纳税人会议和行政机构工部局,并不对英国政府负责,而是对纳税人负责。纳税人会议并不是橡皮图章,而是掌有实权。公共租界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因纳税人会议不信任,而逼迫工部局董事会集体辞职的事,所以孙中山称之为“自治的模范”。

上海租界的这种特殊性质,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重要影响。法律方面,处理与华人有关案件的会审公廨,适用的并不是英国法律,而是亦中亦西。文化方面,上海并不像香港那样唯英是从,而是中西混合,中西并重,中西“两种文明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墨菲语)。社会生活方面,中西风俗并存,既过春节,也过圣诞节。经济方面,上海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加尔各答在印度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美国学者墨菲在1953年出版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曾认为上海的演变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作用,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二十年后,墨菲在对亚洲许多殖民地城市作了研究以后,包括加尔各答、雅加达、卡拉奇、孟买、新加坡、香港,在其新著《局外人,印度和中国的西方经验》(1974)中,对原来的观点作了很大修正,认为上海与加尔各答、孟买,形似而实异。作为西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但上海并没有改变中国。

近代上海是在东西文化交互影响下发展起

来的,在西方人眼里是东方,在中国人眼里是西方。这在中外大城市中实属罕见。

没有政府控制、没有霸权的文化交流,看上去有些杂乱无序,但正是这种状态,提供了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类型

上海史之所以特别受到研究者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的类型意义。

在上海租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少数领事、大班、金融寡头垄断权力,经济上是竭力榨取,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就像英国没有文化部一样,租界没有管理文化事业的文化处,也没有为建立西方文化霸权作太多的努力。德国学者瓦格纳对《申报》历史的研究表明,英国领事、英美租界当局对于美查创办、经营《申报》,并非总是支持的。租界报纸、杂志、出版、学校多为民营。对于一般文化事业,租界当局并不直接干预。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西方文化人,包括一部分传教士,在其本国多属于边缘性人士,如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来上海以后,也没有建立起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

在近一个世纪中,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除了在战争时期,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藩篱,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华界的士绅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正如其无法阻挡江风在华界、租界上空飘来飘去一样,他们也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版图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强烈地刺激着上海人,如细雨润物般影响着上海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海人对西来文化,由诧异、羡慕而仿效、拿来。上海绅商主动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以铺路、筑桥、管理治安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城市卫生意识,都是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同的表示,都是中西文化平静而深层次地交流的结果。

在文化交流中,有意识的、强制性的文化灌

输,有时反而会引起受众的排拒,阻滞文化交流。近代许多教案的发生,都与传教士强行传教有关。无霸权状态下的文化共处与对流,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与融合。西人在租界用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没有强迫华人照办,但上海人经过疑虑、思索以后,见贤思齐,照章办理。西人在租界实行严格的市政管理制度,在工部局和纳税人会议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强迫华人仿效。但是,上海人看到其有效性、合理性,自觉仿效。上海绅商在清末进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所颁布的《违警章程》之类条例,多取法于租界,甚至连“不许倒提鸡鸭”也被照搬过来;所设议事会、参事会均由选举产生,也是自觉仿效租界制度的结果。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长期闭关、交通阻隔等多种因素,真正到西方作实地考察的人是极少数,一般人了解的西方,多是想象中的西方。因此,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流,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没有深入到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中。租界的存在,使得西人不但将其母国的日用器具带到这里,而且将其母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搬到这里,使得中西文化在实践的层面上,共处一地,平静、从容地接触、交流、融合。没有政府控制、没有霸权的文化交流,看上去有些杂乱无序,但正是这种状态,提供了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类型。诚如民国时期一位学者所说:“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我们只要等一等看,便晓得上海的将来为怎样。”

各地移民的不断涌入,使上海文化保持了强大的活力,上海人的双重认同机制则使其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

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49年以前,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他们不是政府主导型的移民,而是市场主导型的移民,不是集团型移民,而是分散型移民。这种

移民构成的社会,通常有以下十个特点:一、人口年轻,二、男性为多,三、不安现状,四、能力至上(不太强调家庭背景),五、竞争激烈,六、重视学习,七、信息灵捷,八、人才共生,九、文化多元,十、比较宽容。这也是1949年以前上海社会的特点。

其中最后两条,至今仍对上海发展有重要影响。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的移民,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这使得上海文化绚丽多姿,形成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重要特色的上海文化。凡异质性高的文化必然同时也是宽容性大的文化,因为多种文化共处一隅,就其相互比较而言,表现为异质性高;就文化整体而言,则为宽容性大。就像极不合群的人在集体生活中必然孤立一样,对别种文化不能宽容的文化,在异质性高的文化环境中往往难以生存。在上海,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安徽人、山东人共处一隅,广帮菜、淮扬菜、川湘菜、北方菜,同样兴旺。南腔北调都能发展,八方剧种都有市场。杂交出优势。多元、宽容是上海文化有持久活力的根本原因。

对移出地与移入地的双重认同,是移民社会的普遍现象。上海人大多既有原籍认同,又有上海认同;在家里说家乡话,在街上说上海话;到外地是上海人,在上海是外地人。这种双重认同,形成了上海社会自我批判的特殊机制。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发起对海派攻击时,海派文人没有一个自称海派。因为,落实到一

个一个具体的文化人,他就位置一挪,成为在上海的绍兴人、潮州人、苏州人,他会反问一声:“我哪里是上海人?”余秋雨在《上海人》中谈到这种现象,当说到一些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时,上海人会在私底下嘀咕:“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这可以说是上海人狡黠的地方,也是上海人身份双重认同的表现。许多上海人都有这种经历,他得到外地人最高的表扬就是:“你真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对这种个别肯定、总体否定的表扬,心安理得,全无恼愠。这在人口单一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双重认同机制,使得上海社会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使得上海城市可以在一阵又一阵的批评声中,一身轻松地可持续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中也包括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声音。

熊月之,江苏淮阴人,1949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联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向专制主义告别》、《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通史·总论》卷等,主编《上海通史》,另有论文百余篇。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与上海史研究。